

徐超：“学外之学”与创新思维

(上接 P 版)

(3) 追求“唯一”的志趣

自己动手的第二个好处，是能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思路去做事。由此就有了第二个习惯，就是志趣不在求功，多是散文，就是做任何一件事情，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制作，其基本追求就是让它成为“唯一”。比如，买来的衣帽、背包之类，最简单的就是局部变一下颜色，换一个部件，等等。再就是，“强烈”不喜欢用现成的东西，而喜欢用自制品、改造品或替代品——当然了，我不用了电视、冰箱，我说的一般都是小物件，像砚台、墨盒、笔洗、笔架、毛刷等。捡回一把破伞，就顺手改造成一个独特的笔挂。买一条西式短裤，随手就能改造成筒式背包。做一个住院用的特殊设计的台灯，它可以调节光照强度和光线方向，在病房可以独用而不会影响他人，而且，打开是台灯，关上就是文具盒，大夫、病友看了都说“有意思”。

我想特别强调一下：上述这种追求“唯一”的习惯，主要不在于它的物质意义，也不仅仅是可以从中得到一种乐趣，它更重要的意义恐怕还是，这种习惯的养成过程，客观上培养了创新意识、创新思维，提高了创新能力。这其实是我的核心观点。

对于我办事或者办事的思路，经常会有人问：“你是怎么想出来的”，我说，惯性的力量。我说的“惯性”，就是习惯之“惯”是经常形成的，而且一旦形成，就必然产生巨大的“辐射”力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一个人的习惯性思维方式，一般都具有“统领”性的意义。就是说，他做这件事，与他做其他的事，其思维方式应该是相互关联、相互影响乃至是基本统一的。这就是我的核心观点。

与此相关的是能力。习惯产生能力，能力也是经长期培养出来的，随着“惯性”的力量，能力也能随之加强。看 4 月 17 日晚间的“越战越勇”节目，一位 98 岁老人，女士，她跟主持人杨帆比赛俯卧撑！因为她本是体育教育，退休后坚持锻炼。能力源自有杨帆的哲理。

(4) 志趣的“辐射”效应

比如我那个“爱受嘉福”石刻，材料其实是一块砚雕，利用它的底部刻一个自己书写、设计的汉代文字瓦当印章。瓦当上的字是正的，那需要做成拓片才能观赏，而我却要当印章用，字必须刻成反的。怎么用呢？把字盖在宣纸上，旁边写书法作品，是不是别致？

我还雕刻了一些我自己不能准确命名的石料小品。比如刻几株兰花长在土里，几条金鱼在鱼缸里游水，与肖形印似像非像，是不是也有点意思？

创造源自设计的灵感，所以凡是创造都讲究设计。广义地说，设计是最大化的产业，因为设计理念和制作可以推广至所有领域。伟大的，邓小平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吗？那小的，如前面提到的我的两个系列展品，600 多个，设计至少是一个重要因素。其他如《纸上雕香》和《介尔景福》，其中包括《松高维岳》，除了学术创意、文化创意外，从审美角度说，设计也是关键。把设计应用于实际生活的例子也有。比如，在厨房与餐厅之间的隔断中间，装一块很大的玻璃板，然后请木工在玻璃的两面，各做一个我设计的博古架。从远处看，是单面的，其实是双面的。这个设计最大的好处，是透过它又有文化气息，还能放置一些小物品或小摆件。

情之所至，一往而深，于是我总结出两句话，叫“精心求一善，是为至善；专情求所爱，是为至爱”。寻找“至爱”容易，做到“至善”就难了。比如书法，我的最大追



自刻汉代瓦印“爱受嘉福”



徐超教授给文学院举办的硕士课程班学员讲古文字学

求是“集美”，就是力求表现汉语、书法、文房、设计等各种美学元素。我当然做不到“至善”，但总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。

(5) “同根别枝”的溯源

物有本末，事有始终，追根溯源，把我要做的事以及相关作品联系起来看，就可以知道，我的一切喜好，其实都是源于我对汉语、汉字的认知，然后由此涉及到的汉语、汉字生出来的文学、书法、篆刻以及其他相关艺术。我琢磨了一下，是不是可以称之为“同根别枝”？就是一个“根”里长出来的别枝芽。比如，我的《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》与《古文字通解 500 例》可以理解为“互根”的关系，或者把《古文字通解 500 例》(大美汉字)看成是《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》向源头方向的延长。我与王洲明教授合著的《贾道集校注》，则体现为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具体应用。《对联艺术》大概可以理解为以小入学入章，可以归入文学。根据启功先生“字是写出来的”理论，写字也可以看成是文学方向的延长。《崧高维岳》《书法教程》《宋诗集》(纸下墨韵)《介尔景福》(千秋利君)《众芳芬》《四水心》以及《并蒂双联》等，主要也体现了语言、文学、文化与艺术的融合。由此可见，最根本、最重要的，还是根基学问、根基文化。

我的以上追求当然也与身边的榜样密切相关，其中给我影响最大最多的是启功先生、蒋维乔先生，他们学与艺的结合，就属于一脉繁衍而别出根芽、自结花果的那种。饶宗颐先生也是这样，几年前出版的《饶宗颐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》，书名就是饶先生题写的“学艺融通”。

与启、蒋二位先生所作所思完全一致。

(6) 两点补充

其一，这个发言，因为特定的主题，所以关于我如何做“学内”学问的事，基本没有涉及。担心遭到误解，所以我希望各位最好还是抽空看看我《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》“三版后记”，以及访谈录《艺术家读书记》(见《一花一世界·新年献礼：徐超教授访谈录》，载《山东商报》主办的《诗书画》杂志)。只要看过其中的任何一篇，相信各位对我的了解就会比较全面、准确一些，至少不至于把我理解为自己不务正业、还在误导别人不务正业的人。

其二，一个人的精力有限，老伴儿说我“脑子不停”“适合去搞航天工程”。其实，我的脑子也是“定向”使用的死脑筋，比如房子、车子这些可以切身享受的东西也不想，这就近乎“傻了”。结果呢，人家都有两个车以上的房子，而我没有。但平常人生大致都是如此，自得其所，自有得失，自有短长。

5 关于创造性思维的思考

(一)“钱学森之问”与“钱学森之答”

文章开始就促使我思考“学外之学”与创新思维这个话题。

“从近处说，有四个因素，现在轮到‘从远处说’了。”

从 2005 年起，病榻上的钱学森多次向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：“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？”这就是关于中国科技前途的所谓“钱学森之问”。

据我看来，钱学森的意愿其实很明确。根据温(中国新闻网)密切的交谈——温家宝看望季羡林、钱学森侧记》，2005 年 7 月 29 日，温家宝总理到医院看望钱学森，向钱老报告了国家未来 15 年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宏伟规划，钱老认真倾听后，立即“思维敏捷地”说：“您说的我都同意，但还缺一个”，钱老接着说的一段话是：“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，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。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，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。没有这些是不行的。小时候，我父亲就是这样对我进行教育和培养的，他让我学理科，同时又送我学绘画和音乐。就是把科学和文化艺术结合起来。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，它开拓科学创新意识。现在，我要宣传这个观点。”

报道又说，早在 1991 年 10 月，国务院、中央军委授予钱老“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”荣誉称号。“他致谢时特别提起他的夫人对他的帮助，认为他的科学成就也要归功于夫人在音乐艺术方面给他的熏陶”。

报道(新华社《钱学森生前多次向总理问总理想，称科学人才太细》)又说，跟随钱老 26 年之久的秘书朱学东助手李元季先生在接受新华社“新华视点”记者专访的时候曾说，“钱老晚年认真思考过

杰出人才培养的问题，他的观点也由理工结合发展为科学与艺术的结合”，又说，钱老认为，“科学创新的萌芽在于形象的思维”形象思维是创新的起点，所以钱超常说，“科学家要有点艺术修养，能够体会文学家艺术家那种形象思维，能够大跨度地联想”。

钱学森先生的思想和观点能够清晰地向我们呈现，起初他提出“理工结合”，后来发展为“科学与艺术结合”，认为“形象思维是创新的起点”，所以他强调“科学家要有点艺术修养”。

我认为，钱学森先生的上述见解，至少也可以视为“钱学森之答”最基本、最重要的一部分。

(二)“钱学森之答”的理论依据

马克思曾说，想象力是促进人类发展最伟大的天赋。这是因为想象是人的心灵最有力的创造，最能体现创造精神，而艺术的本质、艺术的生命，即在想象、设计和创造，艺术创作的过程即是想象、设计和创造的过程，所以，艺术家最突出的本领就在于想象力、设计力和创造力。

这是为什么呢？这与他们长期进行艺术鉴赏和艺术创作密切相关。从艺术创作角度看，艺术实践是一种最热情、最富想象、最具独立精神的创造性劳动，一种精神和实现审美、挖掘美、创造美、唤醒美的实践过程。因此，缺乏想象力、设计力和创造力，就不可能成为艺术家，至少不可能成为优秀的艺术家。从艺术欣赏角度看，情况也是这样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艺术就具有了某种“统领”的意义，就是说，凡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都是创造，扩展开来谈，境界中的学术也是如此，境界中的事业也是如此，境界中的人生也是如此。

6 小结

钱学森先生主要讲高科技顶尖人才的培养，引申开来，从更广阔的层面看，各种人才的培养其实都有一个“结合”的问题。由此我想到启功博士对“博而专”的要求。他说：懂得那么一点点就是博士了？那不是博士，那是“窄士”！所以，我们最好从承认自己无知开始(我的小说《人生九事》中的第一件事就是承认无知)，承认无知，心中一无所有，才能有创造，所以我说的第二件事就是“人人可以挑战不可能”。不断扩充其学，增益其所不能。

还有，通过学外之学或学外余事，可能让你知道，你真正的兴趣究竟在哪里，从而激发你潜在无限创造力。因此，学外之学或学外余事，甚至对开发你的人生也有好处。

顺带说一下创新的基本条件。其一，创新离不开根基。与学术相关的创新，其根基一定是主业学问。其二，从广义意义上的创新，一定是要经过艰苦的努力，所以我经常说，“一艺半功也艰辛”。

(本文为徐超教授在“学术人生大家谈”学术活动第三期：“学外之学”与创新思维)讲话稿，略有删节)



为山东大学新生录取通知书题写的金文“正心术、敦品行、明伦理、知大体”

清晨，金灿灿的阳光透过薄薄的云雾洒向大地，暖暖地照进房间。早餐后，我坐于书桌前，再次捧出王老先生的《暮年梦话》。这本书是王老生前唯一一部散文作品集，也可以说是老先生的文学处女作。虽然之前他著书颇多，但那些都是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专著。

晚夏、古树、老翁，《暮年梦话》的封面，静美而深邃。翻开散发着浓浓墨香的扉页，一行行文字像一个个老朋友跟着我打招呼。这些文章我很熟悉，因为其中很多都在我负责编辑的《山东大学报》上刊登过。这些文字，记录着王老退休以后以不停歇的脚步，也记录着我与王老师的深厚友谊。

认识王老是在 2014 年。当时报社编辑王静老师退休，我接手月末版的编辑工作。工作交接时，王静老师递给我一沓厚厚的稿纸，是软糯的 16K 宣纸，宣纸上一行行端正的毛笔字，工整整齐、清秀洒脱。这是月末版编辑王静老师向王老约稿——《运筹千里》(中、下)两部分。文章全部用小楷毛笔书写，80 多页老稿几乎没有修改痕迹。当时我就有点“懵”了，做了 20 多年的老编辑，平日收的都是电子邮件，就连钢笔书写的稿件也很鲜见了，更何况是小楷毛笔！这沓厚稿与与众不同的宣纸，让我的心中油然而生敬畏感。

王老是一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，他一生都在讲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。他曾任《文史哲》的执行主编，后来又回到哲学院继续攻读他挚爱的马哲史。山东大学在 1959 年重建政治系，当时年轻的王老是从重建政治系的三年开始增加了这一过程。他倾力搜集建系时的资料，用长达 3 万字的文章，回忆了重建政治系长达 6 年的全过程，记录了那段难忘的历史，填补了这一段校史的空白。山人热爱山大的历史，《运筹千里》的刊出，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这篇文章也被档案馆存档。

编辑《运筹千里》文章，我见识到了王老老师的“较真”。《运筹千里》文中有一句话：“魏以铎到哲学教研室。此公对待工作和同事，总有一种满面春风的热情，而且逢人便讲政治那些多种风情的故事。”我看到“满面春风”这个词，感觉不太合眼缘，于是顺手就把“面”字换成了“含”字。一个字的小小改动，回头就忘了。没想到王老拿到清样后，很快就发现了这一改动。他为了给这个字找到更合理的解释，就在校园里四处转悠，以寻找一位专业人士求证。这一段插曲，王老记录在《暮年梦话》的“自序”中：“我在校园里偶然遇见一位文学博士后 P 君，为这个事求她做个鉴定。她在脑子里转悠了一大圈后用赞赏的口气说：‘虽说只改一字，却入骨入髓。让人觉得那种笑是内在的和自然的，显得更丰富。总起来说改得好。’”第二天，王老师到编辑部送小样，又和编辑部的几位报人一起，就这个“含”字探讨了许久。做了 20 多年的老编辑，还是第一次碰上如此“较真”的作者，令人大咧咧的我不免心虚。

王老老师的“较真”表现在方方面面。老先生写散文，拿出了做学问的劲头，文章中每一个词、每一句话，他会做斟酌；每次出文章清样，我会托人送到兴隆山校区，方便住在那里的王老师修改。老先生的腰不好，高大的身躯走路时总弯着，我们看了都很心疼，劝他在家静养。但他拿到清样，第二天一大早就出现在编辑部。他弯着腰，利索地从包里掏出清样，一字一画地跟我对照、沟通修改。稿稿时，幽默风趣的老先生，有时会突然从黑色公文包里变出一个又一个大红苹果，哄得同事们一片惊呼，编辑部里洋溢着欢乐的笑声。

继《运筹千里》之后，王老老师的散文开始多起来。每一篇手稿，依然是用小楷毛笔书写，也几乎没有修改痕迹。看到王老老师手稿的每一个人，都会由衷地发出赞叹。王老老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素养很高，哲学著作论题硕果累累。他专供月末版的《路魂》《信仰》《马克思之所思》《读恩格斯晚年书信》等系列理论研究之作，篇篇皆为上乘之作。

王老老师热心于对晚辈的提携与关心。在我刚接手月末版编辑时，为了助我一臂之力，老先生特意写了一篇《为月末版提挚努力之一言》文章，精心设计了几个新栏目：“拔新领异”，用于别具一格的观点、方法的文章，或者别具一格视角的文章；“时空长廊”，突出一个“史”字，用于记述校史上发生的大事；“水墨园地”，用于短篇的文墨杂谈和独具匠心的书画，也可吸收长篇的散文连载；“校园风情”，突出一个“情”字。他还建议：“以编辑名义，向全校发一封充满诗意的约稿信，连续发个十期八期的”，以获得更多的优秀稿源。

老先生有一个习惯，平时阅读文章时，每每看到好的散文，就会复印下来，天长日久，积累了两大本。他把收集到的散文，特意复印了二份，分别送给我和薛梅梅。托着厚厚的沉甸甸的散文集，感动于王老对晚辈的关怀和提携。

王老住在兴隆山校区的小山小区，那里的生活，点点滴滴进入到他的《暮年梦话》中。“银杏树下”，“南山山下生活的职工来自三个校区，彼此不熟悉。同住一山，远亲不如近邻，山上呈现出一片相互关爱的景象。”王老“银杏树下”以“情”为主线，讲述了山大兴隆山校区的老年人银杏树下生活的乐趣。这篇系列生活散文，文笔亲切而感人。《银杏树下》采用连载的方式在《山东大学报》月末版刊登，因为月末版时间比较长，时不时的有性急的读者会打电话催进催稿，询问下一期的刊出时间。

《暮年梦话》中第二篇是《文房叙梦》。王老一生研究马哲史，究竟是什么触动了他先生，让他在 73 岁开始学习文房语言？他在书中告诉我们：他以为自己几十年从事抽象的理论研究，写散文语言不够生动、文字不书。于是，他开始有计划地读文房大家的散文著作，以此来改变自己的文笔文风。在研读散文文房大家的文学旅途上，他读叶圣陶的著作，读沈从文的著作……读一部就写一篇笔记，比学生做作业还认真。几千字的文房著作读下来，他积累了一篇又一篇长达万言的读书笔记，如《沈从文之风》《血色情怀》《叶圣陶文章中的一些符号》……篇篇都有独到见解。

其实，王老老师的文学素养和文字水平很高。他写的大量的散文作品，如《银杏树下》文字朴实坦诚，《师生情怀》感情真挚，《真诚到永远》就像老朋友坐在你对面拉家常。文字的最高境界，就是用最朴实的语言讲述深刻的道理。读王老老师的文章，就有这样的感觉。他的文章中，从来没有寻常稿件中常见的错别字。老先生哪里还需要在文字上做什么反复、补什么课，实在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。

《暮年梦话》中第四篇是《书法漫笔》，记录了王老十年间对书法理论的研究和书法作品创作的探索，这也是王老师潜心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。他在书法理论上钻研得很深，得出了书法界很多此前没有的、颇有新意的见解。书法实践上，王老也是勤于耕耘，《空谷幽兰》《上善若水》《云从风》《兰亭序》，一幅幅书法作品，件件都是精品。同事们很崇拜王老老师的墨宝，但没人好意思向他求字。王老知道后，从不吝啬，每次到编辑部都会带几张送给我的同事们。记得一年临近暑假，办公室的小同事想请王老写一段话，教育不会轻易爱字。这段话写了一百多字，属于难度很大的书法大作，书法家一般是不会轻易爱字的，但王老立即就点头答应了。第二天要外出地，当晚就写出来并快速送到办公室。小同事拿到墨宝，甚为感激。

在别人颐养天年的年纪，老先生从不停止追求知识的脚步。他写专业论文，写读书笔记，写散文，研读书法奥妙，从不懈怠，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。在稿件清样来回的传递中，在文字的反反复复推敲中，老先生的认真与执着、努力与执着、真诚与热心肠，都给我做出了高大上的榜样，倒逼我在编辑中时时谨慎细心。他的幽默风趣，他的爽朗笑声，他的年轻心态，甚至有些顽皮，让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年龄的差距，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忘年友谊。我很庆幸认识了王老，常常被他激励。

合上书本，我再一次被这本书的封面所吸引：绚烂的晚霞下，硕果累累的大树旁，一位老翁时而抬笔著述，时而静卧沉思，飞舞的蝴蝶轻柔地落在老翁的大草帽上。我想，生命就是一片天空，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目标，无论它发表的是诚实、友谊、理想或是其他什么，我们都不应该停下前行的脚步。

捧读《暮年梦话》

王巍